

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散文卷

作家写作家(D卷)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丛书名：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书名：作家写作家(D卷)

作者：《中国作家》杂志社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ISBN:7-80145-554-1/I247.7

出版日期：2002年1月

定价：7290.00元（全套）



目 录

心灵的回声	(1)
梦想飞翔的大树	(12)
大梦谁先觉 平生我自知	(27)
老派作家叶兆言	(45)
浪漫的田中禾	(54)
放逐城市的田园游子	(67)
特立独行毕淑敏	(83)
大山的儿子	(95)
富道之道	(113)
儿子对诗人的拜谒	(125)
张先生	(138)
我所认识的李瑛	(154)
秦人白焯	(175)
冯牧西去周年祭	(187)
最后的爱	(197)
吹尽黄沙始到金	(207)
徐小斌之谜	(224)



作家写作家

痴恋生活	(238)
燕赵壮歌	(256)
海的朝圣者	(277)
“俊马”仁山	(291)
坎坷译路	(296)
舞者迟子建	(326)



心灵的回声

——追念葛洛

李清泉

—

大概去年四五月间，我到安定门宿舍去给王朝垠送篇稿子。好不容易来一趟，我说顺便去看看葛洛吧，王朝垠陪着我去了。年老了，距离远了，昔日朝夕相处，如今成了难得一见的稀客，葛洛高兴地又端茶，又端酒菜地忙碌。忽然谈起前不久和曹兰在文采阁举行了金婚式，说是还拍了录像。这在我们生活中还是新鲜事，很想见识见识，我表示想看一眼，自然也便放录像看了一眼，很为他们有如此浓厚的家庭生活兴致而欣喜。

九月，作家协会的老老少少，齐集在机关检查身体，离退休的也去了，熙熙攘攘，打破了机关的清冷，眼下机关大概也难得这样有号召力的事情了。没过几天，听邻居告我，葛洛检查出肺癌，而且扩散得已很严重。心里立刻一沉，办过喜事的笑眼还睁着呢，而听邻



作家写作家

居转告医生的口气，似乎只能拖到新年前后，便要办丧事了，真是人生无常！

就算年老腿脚不便吧，论关系打个电话以示关心是应当的。正因为是癌症而不是别的，使我顾虑重重，未敢造次。因为发现这种病之后，常有各种不同的处理方式，确有怕加重病情，向患者封锁保密的，漏了口风，岂不罪过。这癌症就像贼，潜行体内，繁衍得十分疯狂，却又了无声息，无影无踪。一旦查出了它，它就变成叫你无可奈何无法制服的强盗，行凶作歹，劫夺一切。面对着这样的蠹贼和强盗，除了当事者自身的洞明，宽解，岂是别人的几句安慰能济于事的。

到了国庆节，因为有个节日问好的由头，我催促自己拨通电话，哪知种种犹疑顾虑，电话一通全然白费心机。先是曹兰告我他患了肺癌，孩子联系了肿瘤医院，因为难得有病床空出，所以便搬进去了。这两天他请假回家过节，明天便回医院。既不封锁，话语又很平静安详，没有临危临难的语意和情态。待葛洛说话时，我问他情绪是否稳定，务必要开朗和乐观，精神是可以在正反两方都发挥作用的，千万不要背包袱。他笑呵呵地连声回答，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还向我举例：“你看古元，多少年的癌症，现在不还是活得好好的。”古元是他长期的好友，过从甚密，古元的情况，当然是他身



边一个活的实证，断无虚言。我听后也十分仰赖和安心，但愿他和古元一样化险为夷！

不知道什么时候病情恶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由肿瘤医院又转移到中日友好医院，等我打电话问葛洛的住房号时，曹兰犹疑，她说你年纪那么大了，路又那么远，由于我坚持，最后才不得不告诉我房号。

我老伴也要一起去，她自身也是个病号，要避开她上医院、打针、服药等等，还须避开她精神欠佳的时候，因而迁延复迁延。等到去医院探视时，葛洛朝窗侧卧，在打吊针。我喊了一声，他才略略转动身子，贴着毯子的手，往前移动了一点点，我赶紧伸手过去握着，连最不费力的眼睛也迟滞了。想说话，嗫嚅着说出几个字音就没气力说下去了，还微微听出有痰的臃塞声。起几次头说话，最终也未说出一句完整话，看他太累，干脆不许他说了。后悔来晚了，站立床侧不免愁容戚戚。想想这个局面，对于病人也是负担，不宜久留，便退出来了，心里不断萦回着往昔岁月的情景。

几日后曹兰电话中说：“葛洛走了！”就像那支出名的《回声》合唱，各个声域接应着不断传出：“走了！走了！走了！……”由近及远，进入冥漠……



二

葛洛比我早几个月到延安，他是先入的“抗大”。我从贵州出山的时候，本是寻求去延安的路子，在尚无头绪的时候，却毫无困难地获得去“晋察冀”的机遇，在那里干了不到一年。由于难以对延安的诱惑断念，得到政治部舒同主任的同意，终于如愿。

到延安就直奔“鲁艺”，进“鲁艺”就和葛各一个窑洞，这是1938年冬我们最初相见，半个多世纪以来，革命进程中有过多少聚散，有过多少悲欢离合，我和葛洛多次散而复聚，这次分散却是阴阳两界，他乘鹤而去，飞赴幽冥。

且说我们那个窑洞的八九人中，有广西、有山东、有江浙、有河北，有来自曼谷的归侨，我是江西，葛洛是河南，这才真叫四方杂处，若不是一个共同目标的吸引，怎么会凑在一个窑洞里，这又是多么可贵。

延安被称为歌唱的城，其实不确。延安城太小，经过几次日机轰炸，瓦砾遍地，延安的歌声漫山遍野，而不在城里。因为十分开怀，自吟自唱，山上河边，无处不唱，凡有或大或小的群集，更是此起彼伏地比着唱。若有不唱，便齐声起哄，叫做“拉歌”。延安就像开了锅一样，有烧不完的燃料，使它沸沸扬扬。但我要说，



像葛洛那样缺乏形诸于外的热情的人太少了，他太内在、太持重、太严谨，连话都少，更不必说唱。1940年以后，唱歌之风零落了，交谊舞渐兴，唱歌跳舞“鲁艺”自然是条件优越，但是舞场上也仍然没有葛洛的踪影。

文学系第一期听说不满二十人，三个月便分发前方了。我们是第二期，从1938年冬到1940年夏，学习时间长了许多倍；校址从北门外迁到桥儿沟，学习条件也有很大改善。我们这一期是文学系的最盛时期，一度多到六七十人。不断进进出出，最大一次是调人到“晋察冀”去建立华北联大，光文学系就走了三四十，迁到桥儿沟就剩下二十来人了。

在北门外时，年龄比我大的不少，到了桥儿沟大概除了贾芝就数我了。那时大抵凭着外貌和感觉，都觉得葛洛不小，实际他比我小两岁，好几个我都觉得比葛洛小，实际上不一定。葛洛到延安是十八，比他再小的虽有也少，因为去延安总须有些觉悟和独立生活的能力。系里有几位当时被目为“骑士”的同志，常常在窑洞里扬臂高呼：“打酒来吧！杯在哪里？”其实这在现实生活里也很容易说出的，但却是颇耐吟味的诗句，忘了是从哪位名诗人的诗中摘引的。八个字豪情满溢，也显出呼喝者的恣纵。若有谁在此时插上一句：“谁有本事喝上



作家写作家

一两试试。”虽是实情，却未免大煞风景，破坏情绪。葛洛决不会跟随“骑士”们呼喝，也不泼冷水，他只会静静地莞尔一笑。如今我早已成酒徒，经常打酒寻杯，这两句诗却早到九霄云外了，因为早没有诗，已经散文化了。

一度是文学系同学，后来转到“文抗”去了的魏伯、葛洛和我，关系不错，称得上朋友。延安时候的朋友，也仅仅比一般同志更多一点理解、信赖和相投，延安社会单纯，产生不了广泛的内涵。记得十年前魏伯也因癌症病逝，追随灵车之后，从人民医院送到八宝山，除家属外也就我和葛洛。

记得有一回葛洛翻看了我的日记，他在那页日记眉额上写下他看了，很不应当，向我道歉。当时的情况是窑洞里那么多人，仅有一张方桌，桌面下有块隔板，是大家搁东西的地方，有人怕别人看的東西就藏在枕头底下，我连日记也放隔板上，东西堆得多难免误翻误看，即便好奇心驱使，看一眼也无伤大雅。这件事我之所以能够记得，不是因为我的日记被人看了，而是因为他郑重其事地在我日记上写下的自责，我格外感到他为人之真诚。

文学系学习结束，贾芝、杨思仲、葛洛、林蓝、陈寒梅、夏蕾和我等人入文学研究室，并立即分别到部队



和农村深入生活。那次下去的四个人，回来后除葛洛有结实的创作收获外，其余的人，在当时和以后似乎都没有关于那次生活的创作表现。

我在文研室的一次生活会上，和孔厥发生了冲突，我难以忍受他对我的侮辱，举起坐凳砸了过去。这样突发的暴烈行为，引起慌乱，只好散会收场。因为他完全不是正当的批评，而是含沙射影，尖酸刁钻的攻击方式，使我激动战栗不已，决心脱离文研室。

当时除葛洛一人板着脸向我作严厉批评，别人好像都有点回避，周扬同志相遇时，也只问问最近情绪如何。后来阅历渐深，火气渐消，反而觉得葛洛批评的可贵。

三

葛洛的创作，就我所知，有《我的主家》、《风波》、《卫生组长》。即使还有别的，我估量为数也不会很多。葛洛的这几篇作品，都是他在延安乡下当副乡长期间的生活体验和认识，现在来进行具体分析已无可能，但有几个突出点是至今难忘的：第一，他笔下的农民，既有新天地阳光照耀下的觉醒，又有陕北农民的地域特色。早就有农民进入文学，但这是进入文学的新农民，葛洛是较早几个写新农民的作者之一。而且还须指出，他笔



作家写作家

下的农民没有填充知识分子情调和行为；第二，毛主席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是1942年，铅印发行《讲话》大约在一年之后，葛洛这几篇小说先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时间约在《讲话》发表之前，由于毛主席不止一次到“鲁艺”作文艺讲演，由于“鲁艺”的教学方针教学实践遵循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导，而葛洛又老实地身体力行，所以他的创作没有抵触，与《讲话》主旨相符便毫不足奇；第三，葛洛的作品很少用词藻去彩绘，也不作单独的场景描写，而是紧贴着人物，语言简练素朴，风格就像黄土地一样诚实无欺。

我在周扬同志主编、却在国统区印刷发行的刊物——《文艺战线》上，读到过1939年一期的也是写陕北农民的小说，题目忘记了，作者是野蕪，是文学系一期的同学，小说摆在刊物的头条位置。文字俊秀，生活画面的色彩也很招人，写得也有韵致，应算人才难得。若与葛洛作品相较，外观上属于不同类型，也可以说有些优势，但作品内涵上的深度和人物的厚度，却比葛洛略差一筹。

我只是就我看过的葛洛作品，谈点留存至今的笼统印象，无意于把他当成作家认真评价。我们这些人，手中固然有一枝笔，但这枝笔既不自由自在，也不高于一切，在人生的长征中，经常会遇到多种多样的具体矛



盾：比如在缺吃的时候，你拿笔还是拿锄头？在缺穿的时候，你去不去摇纺车纺线线？到了战场上，是不是要端上沉重的枪？八路军一般都不许拿笔的人上火线，但游击战争中又哪能严格地分得清前后方？就拿葛洛当副乡长来说，虽说是为创作而去生活，但首先他得深入群众，竭尽副乡长职责。在矛盾面前，毫无疑问，我们都是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十分自觉，毫不犹疑。就说当编辑吧，葛洛是五十年代《人民文学》的副主编，都到八十年代了，仍然是《人民文学》的副主编，而且就在这个岗位上，终结了自己的编辑生涯。主持了长期的刊物编辑工作，取得高级专业职称应是理所当然的，可是1982年首次布置职称评定的时候，由于名额限制得很少，考虑有些业务上强，又有作为的年轻同志会被堵塞，因此葛洛和我都自动放弃参加评定职称。以后又再一次进行不作名额限制的职称评定，在这样名正言顺的事情上，我们都不愿启齿、不愿伸手索取。因此徒有编辑家之名而实不至。葛洛不追名逐利，更耻于伸手索取和不顾脸面的钻营，我甚至觉得从这个角度谈他，都有点降低档次。

四

大概流年不利吧，怎么第四季度以来，这么多熟人



作家写作家

接二连三弃世而去。我去年末在给外地朋友写信时很有感慨，并告诉他“鲁艺”又有哪几位辞世走了。还告诉他葛洛患了肺癌，病情沉重。过去在一起时，他们并不投合，可是他复信时却单说葛洛是个好人。老战友之间称赏的好人，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有一些特定的意味。原来很不投合的人的称赏，更是难得更有意义。

由于葛洛遗嘱“不发讣告，不印发生平事迹，不举行告别或任何悼念活动。”所以我几乎被拒绝。在医院简单的停灵间，不断有去告别的人。因为葛洛摒弃一切，无法打个电话报名送花圈，所以选购了一束鲜花，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用鲜花表示情谊和怀念。

葛洛像是睡去了，生怕惊醒他似的，我悄悄地将鲜花置于他身边。

葛洛的遗嘱还说：“骨灰长久保留，可用简便方式抛洒在中华大地上，使我回归大自然。如果条件允许，也可找一个地方，把骨灰埋下，上面种一棵松柏或泡桐，让我的生命转化成枝叶繁茂的树木，继续挺立在大地上。”

我和葛洛相处日久，无论工作和生活，我都只感觉到他十分严谨、匆忙，即便闲时漫步庭檐，也是心事重重，无轻松感。唯独这份遗嘱教我产生了异常的新感受，他显得十分澹泊，十分潇洒，十分从容不迫。而这



是他面对着死亡的时候，我不免为之一惊又为之一叹！其中还不无幽默感，你读读那句“骨灰长久保留”的下文，和人们正常说的骨灰长久保留相背，是中国人那种反话式的幽默。

我向葛洛三鞠躬之后久久凝视着遗容，他的脸型、肤色、形体，除了岁月的磨损，没有突出变化，从延安窑洞的第一眼到现在，其间我们经过多少巨大的历史震荡；我们在惊涛骇浪中，曾几度沉浮；他身上留下多少我往昔的旧事……我凝视着不忍离去，好像我不仅仅是离开他，我失去的太多太多……



梦想飞翔的大树

——关于叶延滨

曹宇翔

……根扎进了传统的土壤，越扎越深，而枝叶却以叛逆的姿态向天空伸展，展示一个飞翔的梦境。

——摘自《叶延滨诗选》

1

诗人叶延滨脚步轻捷，英气逼人，一路谈笑风生。从少年时代至今，在“长征小分队”从四川凉山步行到北京的风雪路上，在陕北黄土高原一个叫作曹坪大队的知青点，在军马场化肥厂大学校园，在《星星》诗刊编辑部，在当代中国诗坛，他被许多朋友所簇拥所热爱，有如首领。

人世沧桑，路途多艰，命运曾迫使多少优秀男儿女儿流下悲怆、屈辱、绝望之泪。在成长过程和往昔岁月



里，大孤独，大寂寞，大痛苦，甚至饥饿，甚至心灵的累累伤痕，这些，叶延滨也曾一样不缺。可是怪呢，没有什么能摧毁他的乐观天性，您瞧，他几乎从不伤感。

时不时调皮地把路上石子踢到一边；

时不时学雷锋做好事，像二年级小学生；

时不时拍一拍伙伴们的肩膀；

时不时，孩童般天真大笑……

一般来说，他用笑声、诗歌、散文、杂文招待天下朋友。

中国古代和外国的诗人们（这些天才），所到之处除了分别留下大名、诗篇、酒瓶和烟蒂，大都还要慷慨留下一些笑话、绯闻和艳事。颇壮行色。又是一怪：叶延滨近几年不抽烟（过去也抽，一天一包是小意思，算得上模范烟民），不喝酒（在延安插队时也是著名的大喝，论碗，出门就睡在水沟里）。

英俊，优雅，机智，热情。天，多少年来他竟纯洁得如一尊白玉雕塑。诗名远播，大将风度，见了年轻女性却话少，他还有些羞涩哪。

还有一怪：别人越活越老，他越来越年轻。岁月干瞪眼，简直拿他没办法。我见过他1982年与老前辈艾青、严文井的合影照片，那模样，哪像个诗人呀，比我还土，土态可掬，不愧当过生产队副队长，还戴着眼镜